

中国
现代文学
诗歌版本
闻见录

(1920~1949)

张泽贤 著

张泽贤 著

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

(1920~1949)

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 1920 ~ 1949 / 张泽贤著.
上海: 上海远东出版社, 2008
ISBN 978 - 7 - 80706 - 847 - 1

I. 中… II. 张… III. 诗歌—版本—研究—中国—1920 ~
1949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9510 号

策 划: 黄政一
责任编辑: 张喜梅
封面设计: 张晶灵
版式设计: 李如琬

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(1920 ~ 194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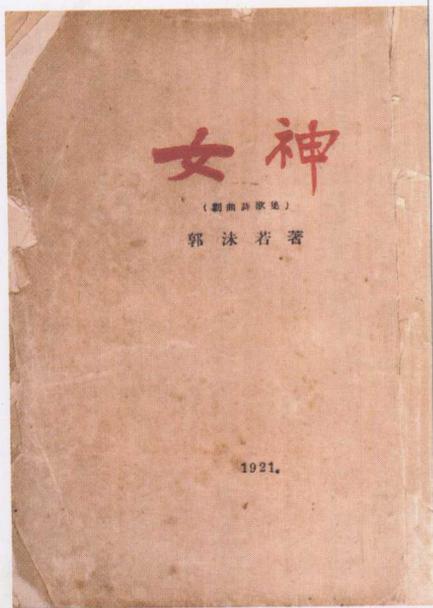
著者: 张泽贤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邮编: 200336
网址: www.ydbook.com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制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
装订: 上海张行装订厂
版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印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字数: 523 千字
印张: 20.125 插页 5
印数: 1—3250

ISBN 978 - 7 - 80706 - 847 - 1/G · 954 定价: 6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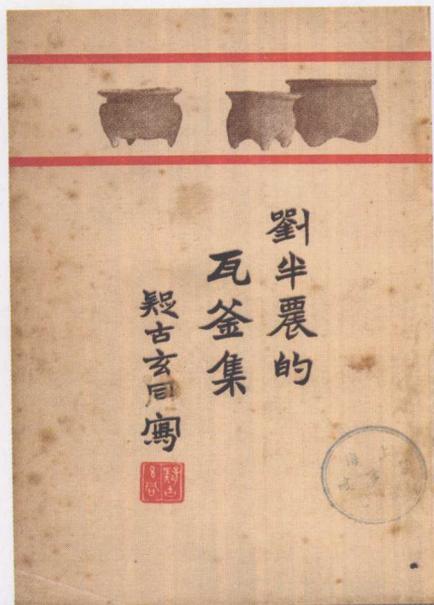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62347733)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零售、邮购电话: 021 - 62347733 - 8555



《女神》(郭沫若著)



《新詩年選》(北社編)



《劉半農的瓦釜集》(劉半農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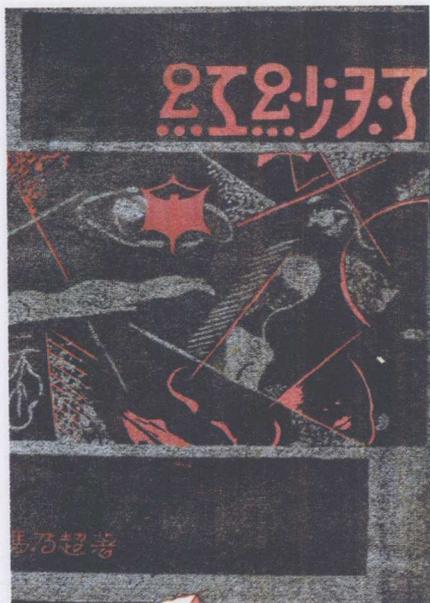
《蛋歌》(鍾敬文編)



《君山》(韦丛芜著)



《翡冷翠的一夜》(徐志摩著)



《红纱灯》(冯乃超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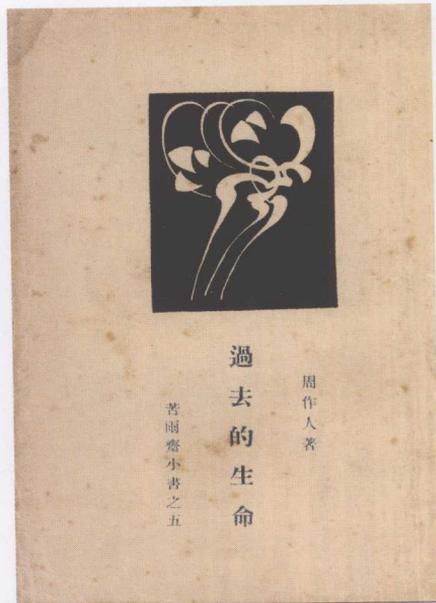
《他乡》(焦菊隐著)



《岭东恋歌》(李金发编)



《乘桴集》(柳亚子著)



《过去的生命》(周作人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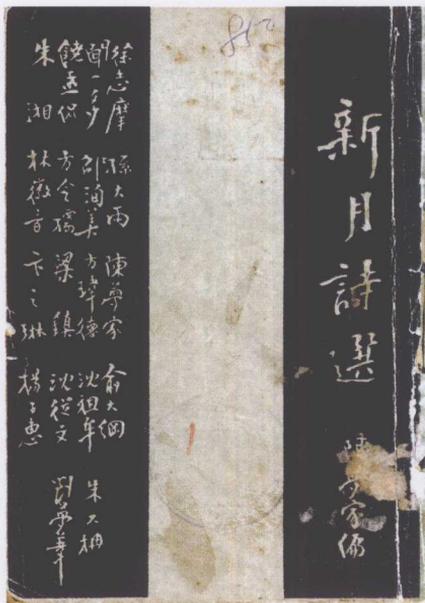
《誓言》(陈伯吹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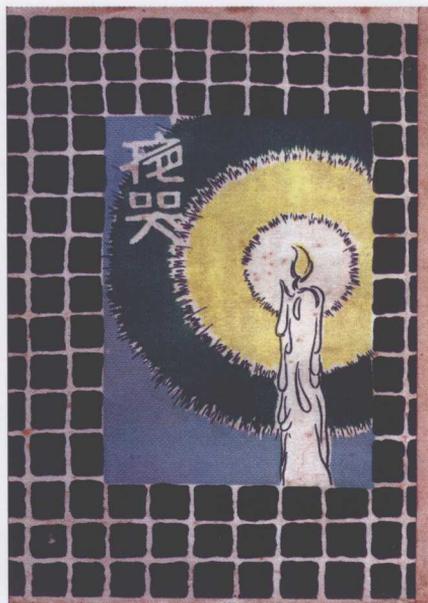
《繁星》(冰心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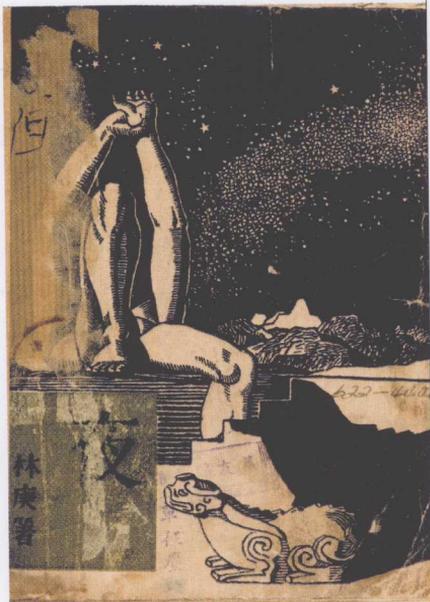
《狮子吼》(王平陵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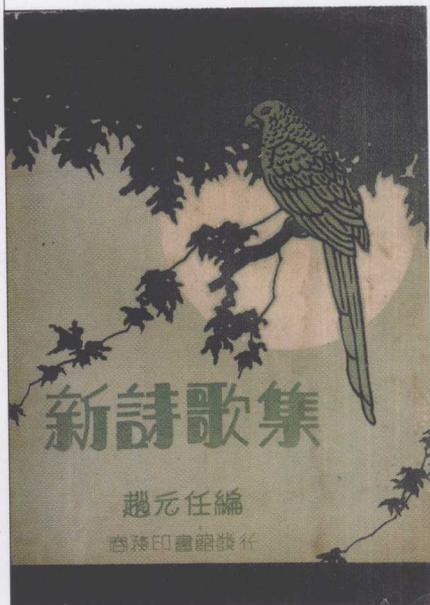
《新月诗选》(陈梦家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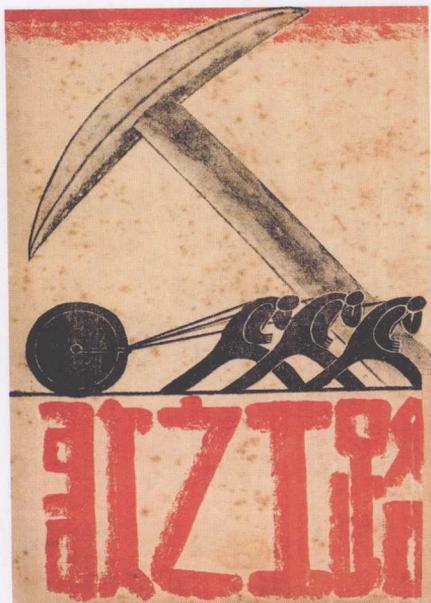
《夜哭》(焦菊隐著)



《夜》(林庚著)



《新诗歌集》(赵元任编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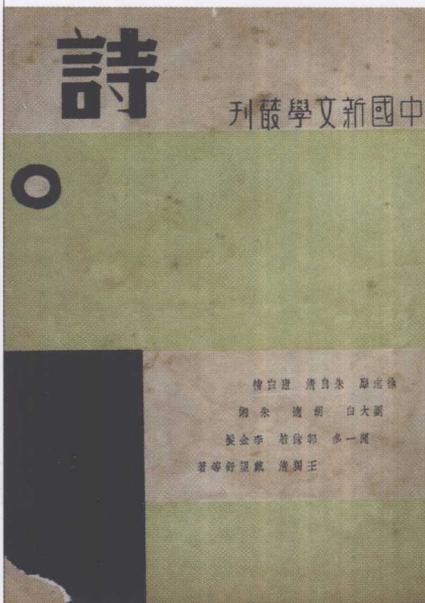
《路工之歌》(江岳浪著)



《六月流火》(蒲风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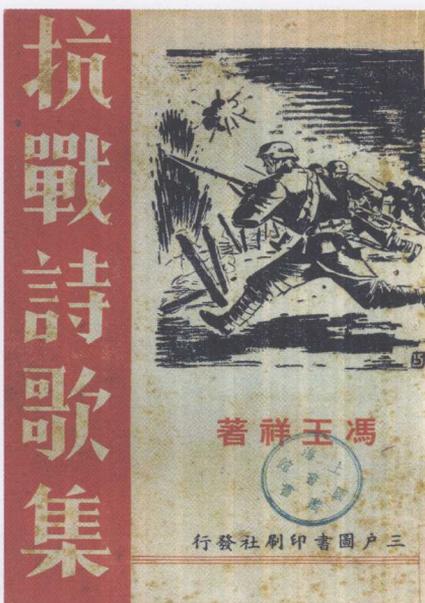
《十二月》(王亚平著)



《诗》(钱公侠、施瑛编纂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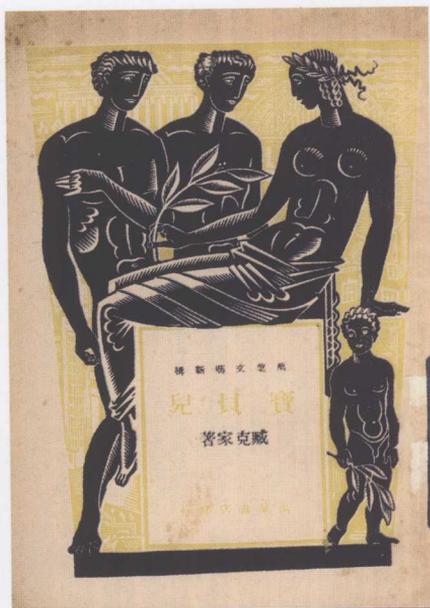
《开拓者》(诗歌丛刊社编)



《抗战诗歌集》(冯玉祥著)



《冬天·冬天》(袁水拍著)



《宝贝儿》(臧克家著)



《小面人求仙记》(梅志著)



《手掌集》(辛笛著)

誘惑的城市

羅迦著



詩海叢上

《誘惑的城市》(羅迦著)

文藝創作叢刊

黎明的通知

艾青著

《黎明的通知》(艾青著)

艾青

火把



文藝叢刊之十二
文化生活出版社

《火把》(艾青著)

中國新詩壇的
昨日今日和明日



《中國新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》(草川未雨著)

自序

《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(1920~1949)》，虽是继《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(1905~1933)》之后的又一部介绍现代文学版本的书籍，但更主要的成因还是有感于现代新诗史著作的大同小异，甚至类同，且缺乏“史的形象”而激起的一种写作欲望。当拜读了不是科班出身的沈用大先生的《中国新诗史》——一部很有思辨力的大作后，也为这部好书缺乏版本形象而遗憾，因而很想从新诗集版本的角度来对“新诗史”进行形象“修补”，以此说些“形象话”。

其实，要想为新诗版本说“形象话”，也非易事。从现今所知情况看，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中，出现过众多新诗流派，诗人以百计，诗集以千计，诗篇则更多更杂，当以万计，如此众多诗人、诗集、诗篇，哪怕只把新诗集拿来研究，靠一己之力也是很难弄清楚的。如以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》收录的700多位现代诗人、1300多部诗集的书目为依据，能见到其中部分诗人五分之一的诗集版本，已经够幸运了。因此，从此意义上讲，要为新诗史说“形象话”，也只是“以点及面”的话语。不过，即便是这么些“形象话”，也够让人兴奋不已了！

这“兴奋”，不外乎三点：其一，从未见到过这么多诗集版本书影，包括名诗人和名不见经传诗人的诗集版

本；其二，从未听到过还有这么一些诗人的新诗集版本，特别是一些从未“入史”的诗人的版本；其三，从版本的角度，将改变或者否定过去一些违背历史的、不完整性的认识，这是在看到众多诗集版本之后的一种必然结论。

兴奋的理由可能还有，但这三点应该说是主要的。

现在还留存在世的新诗集版本，较之现代文学的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和翻译版本来说，数量相对较少，但就是这么一些版本，现在也已经非常罕见了。这些版本，私人手中有藏，数量极少；国家图书馆有藏，数量较多，但也很不全，漏收、失收的新诗集版本仍然不少。即使较为完备的《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》中存有的书目，“有目无书”的现象还很多，看不到的版本实物也不在少数。再说，以往能见到的“版本实物”，留存在书籍上的形象也很干瘪，数量也少，且只限于某几个作家的诗集，绝大多数在当时大有名气或小有名气或名不见经传的诗人诗集，根本无缘见到，似乎这些诗人在现代文学史中根本就没有存在过……如今，笔者不揣浅陋，把自藏、他藏、私藏、公藏，所能见到的新诗集版本认真梳理了一遍，辑录了将近200种新诗集的版本书影、版权页以及其中印有的插图、照片，并记录序、跋等文字，以较为完整的形象，“复原”了这些诗集版本的“基本面貌”，同时也复原了这些版本主人的“血肉之躯”。可以这么说，读过众多新诗史著作的朋友，再读这部诗歌版本见闻录，定会感到眼前豁然开朗，激动不已……这种“兴奋”，将增进喜爱现代文学的朋友们对新诗史的理解与认识。

熟悉新诗史的朋友，在这方面的知识再多，特别是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专业的朋友，以往也只是认识了几位耳熟能详的诗人，以及由他们所“构成”的“历史”，如郭沫若、艾青、徐志摩、蒋光慈、蒲风、任钧、王独清、杨骚、袁水拍、臧克家、邹荻帆等，但是，即便是这批长期受到“推崇”、出版过较多新诗集的诗人，其中不少人，也因着某种历史或人为的因素，很早很快就在人们面前消失了，如蒋光慈、王独清、杨骚等。这

种消失,是诗人连同诗集一起的消失,是一种“彻底”的消失。而留存于世的,只有几个少得可怜、被捧得很高的诗人。然而,哪怕是这些戴着桂冠的诗人,他们的诗集版本也还是难以完整地看到。所有这一切,使人们对于现代新诗史的认识,始终在一种扭曲、残缺和可怜的境地中徘徊,完全囿于狭隘天地而不能自拔——似乎,中国现代的诗歌界,只有这么几位崇高而可怜的诗人在支撑着现代诗歌的“蓝天”!从笔者搜集的、以往从未见到过的诗集版本来看,即便是读过新诗史的朋友,仍会大吃一惊的,其中有不少诗人,在比较完整全面的新诗史中,仍然没有他们的“位置”!紧接着,人们便会扪心自问:“一部完整的、文字与形象俱佳的新诗史,到底何时才能浮出水面?”——这就是现时人们对于新诗史,或者说是对于整个文学史,希望能说“形象话”的一种“企盼”!这工作虽很重要,但又不能一蹴而就,是需要众人不懈努力的!

以往的现代文学史,无论是翻译文学史、戏剧文学史,还是诗歌文学史等,都存在着一种因极“左”影响而导致的残缺与扭曲,并由此而框定、禁锢了几代人的思想,形成的是一种不完整的文学史定势。这种不正常的现象,一直影响着对文学史的认识和对文学史的研究。即便是近期出版的各种不同的文学史,仍然还残留着不少违背文学史发展规律的现象,仍然跳不出对文学史不完整和存有偏见的诠释。笔者之所以推崇沈用大的《中国新诗史》,正在于它少有偏见且还相对完整之故。因此,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,也并非一朝一夕能做到的。虽然从理论上完全可以用文字加以表述,并逐步改变对文学史不完整的诠释,但此路也不会很平坦。笔者在想,如能开辟另一条路去探索,也许是个好办法。比如最有效的方法,那就是从现存还能见到的版本中去挖掘作家、诗人和历史的版本形象,以形象扭转文学史文字表述的枯燥,以及无法说话的“哑巴现象”;以更为直观的形象,为众多理应成为文学史主角的小说家、散文家、戏剧家、翻译家和诗人张目,并让他们与戴着桂冠者一样,也能在文学史中占有自己“形象”的一席之

地,从而使文学史更加趋于完整!——这正是笔者著述《中国现代文学诗歌版本闻见录(1920~1949)》的初衷。

其实,对新诗集的感悟,除了以上三个“兴奋点”外,也许还有很多,那也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。笔者在细读了不少新诗史,以及看到不少新诗集版本之后,也就产生了自己的“仁智观”,也可以说是一种“自我理解”,这“理解”可归纳为两个字:“诗场”。

“诗场”,是笔者的杜撰。这“场”,就同人们熟悉的“磁场”、“气场”一样,也是一种物理现象。笔者之所以要用这样一种形态来理解“诗歌”,那是因为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五大门类(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翻译)中,诗歌是最能体现“场”的效应的一种文学类型,而且,它就是在“场”的作用下孕育、产生、运行、奔突与前进的,它所形成的轨迹,相对于其他门类更为清晰可见。

“诗场”的产生,首先得力于诗人——诗人是“诗场”的“源”。那么诗人又是一种什么“物质”呢?对诗人的定义,在以往的诗论或诗史中,可说早已谈“烂”——这并非贬低,而是事实。比如,说诗人是“创造者”,是“天才”,甚至还说诗人就是“大情人”等等……凡此种种,都是抽去了诗人的“物质属性”而产生的必然结果,其中有合理的成分,但更多的是虚无飘渺的无稽之谈。

笔者对诗人的理解是物质性的,可以归纳为这么一句话:诗人是一些能敏锐感知自然、人类、社会等微弱变化和强烈律动的“动物”。就如同那些能敏感于地震前兆的动物一样。当麻木的人们还未感觉时,诗人已经感到了“微动”,以及由微动可能带来的巨变;当人们感到了“微动”时,诗人已经准备迎接巨大的变革;当人们被动地处在变革中时,诗人早已擎起前进的大旗,在前面摇旗呐喊、大声疾呼了!当人们处在激流漩涡中,想摆脱想求生时,诗人早已在为使命而献身,或死亡,或新生……

这就是笔者心目中的诗人,而且还十分坚定于这样一个观念:如

果撇开诗人的“物质属性”，强加于他一些人为的属性，那么新诗论者再怎么努力，也将永远无法“复原”新诗史完整的本来面目，也无法写好和写全中国的新诗史，这可以说是以往成型的新诗论和新诗史较为致命的一个弱点。

正因为诗人有着固有的“物质属性”，因此，他（她）必然会把敏锐的触角所感知到的“物质”或“非物质”，以文字、韵律或节奏加以尽情地发泄与表达。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最先出现的文学体裁就是“诗歌”，那是一种原始的感知，受情绪、良心、使命驱使而产生的韵律与节奏，一旦产生，也便成为另一种“物质”，同时又以“物质”的形态去激励、感动所有的人……笔者想，新诗与旧诗的最大区别，就在这里。新诗不受“格律”与“框框”限制，而是受感觉的律动驱使，如以这样的标准来选择“入史”的诗人，那么一大批在当时呻吟过、叹息过、狂呼过、呐喊过、发过微光、燃起过烈焰、曾被排斥在外的众多诗人也许就可能重获“新生”。

“第三种人”的代表杜衡曾经讲过一句至理名言：“在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是诗人！”这句话的关键词是“年轻”。“年轻”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敏感、激动、热情，甚至犯错。在此时，“犯错”也变成了可爱，那是应该会被原谅的。杜衡的“年轻论”，与笔者的“物质属性”是相吻合的，也就是说，唯有使所有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出现过的诗人都能入史，那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，道理很简单：只有先存在，才可能有评判！具有评判价值的史著，在史料残缺的前提下，能够自圆其说吗？显然不能！

当然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例外，或者称之为“个案”。比如一些著名的作家，在其年轻时，压根儿就没有写过新诗；有的虽写过新诗，但后来并没有成为新诗人，甚至仍回到了旧路，热衷于去写旧诗了；有的虽写过新诗，可是从未出版过新诗集，这样的作家如果着意统计的话，估计也不少……另外，还有一些较为奇妙的现象存在，比如推崇过“普罗文学”的诗人，也会写出伤感的诗；而陷于颓唐的诗人，也不时地写出

激奋的诗句,呈现出的是种种矛盾体,而所有矛盾体,都是由“诗场”之源的诗人所引起的……

对诗人的感知一旦建立起来,也便进入了“诗场”的第二层次——诗社和流派。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来理解:只有有了诗人,才会有诗社和流派,诗人仍然是“源”。但是,单个诗人在呻吟、呐喊、歌唱之后,总感到有一种孤单与寂寞感,并为这种感觉所驱使,向四处寻觅唱着相同旋律与节奏的志同道合者,于是便形成了诗歌社团,几个或十几个诗人聚在一起,同声吟唱,歌声嘹亮,形成了一种“诗场”的震动效应;同时又在一起相互切磋,共同提高,“诗场”的内涵得到了提升,久而久之,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流派,笔者认为这是“诗场”的一种非物质形态。谁能准确说出“流派”的物质性吗?很难,但它确实存在,且以一种“流”的形态向四周扩散推进,从而又反过来对诗人和诗社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,“诗场”的效应显得非常明显。

然而,“诗场”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,当它受到内力与外力的影响时,“场”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分离瓦解,也可能重新形成新的组合,形成新的“场”——只要认真读一读少有偏见的新诗史,您就会有深切的体会,在此无需赘述。

在“诗场”之中,诗人、诗社与流派,这三者是在“场”内发生相互作用的,而这种作用加上外界合力的结果,便产生了新诗集,也就是版本。因此,新诗集版本是既有“诗场”的痕迹,也有“诗场”外附带的种种形态,而最为突出的形态,就是版本能突破时空的限制,“无限”地延伸下去——当诗人死去、诗社和流派消失后,十年,百年,甚至千年,版本可能仍将存在。它的寿命远比“诗场”内的物质长寿,如果没有天灾人祸,再加上精心保护,它也许就能真正“万寿无疆”!它的长寿,也就是在延长诗人的寿命,使诗人在肉体消失后,保持精神的永存。而百年之后的人们,对诗人、诗社、流派的认识,并不只靠文字记载,而更多的是以版本形象为切入点,去揭开新诗史的另一種崭新历史……这历史,